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王爱松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 王爱松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 蒋树声主编）

ISBN 7-305-04221-8

Ⅰ.**当**... Ⅱ.**王**... Ⅲ.**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Ⅳ.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1692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著　　者 王爱松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686347
网　　址 http://www.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l@publicl.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溧阳晨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87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4221-8/I·320
定　　价 23.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任天石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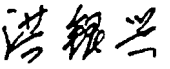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 年 5 月 20 日

目　次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洪银兴)
第 一 章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1
第 二 章　王蒙:从单纯到“杂色”…… 47
第 三 章　张承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灵史”…… 68
第 四 章　张炜:秋天的愤怒与思索…… 94
第 五 章　贾平凹:矛盾中的挣扎与沉沦 …… 114
第 六 章　残雪:“阴郁的生存处境之歌” …… 137
第 七 章　余华:肢解的梦魇与人性的复归 …… 156
第 八 章　莫言:故乡想像与杂语写作 …… 187
第 九 章　苏童:南方的孤独与忧郁 …… 209
第 十 章　马原:虚构的快乐与快乐的虚构 …… 229
第十一章　格非:存在的眺望与沉思 …… 246
第十二章　刘震云:面对苦难的游戏与反讽 …… 263
第十三章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 283
第十四章　王小波:绞刑架下的幽默 …… 305
第十五章　文学多元化时代的来临…… 327

参考文献…… 356

第一章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

“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通称“新时期”的历史时段里，中国文学逐步结束了一体化的文学时代而走向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大致的发展轨迹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国作家一方面抱着极大的现实干预热情，以文学参与了历史清算、现实调整、文化重建的工作，一方面又有感于过去中国文学与现实政治贴得过紧、得不到自由发展空间的教训，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文学走向自身，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成为一股重要的理论与创作潮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展开与“全球化”时代的迅猛到来，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迅速分化，各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立场的分歧趋于表面化与公开化，相应地，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文革”后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尤其关注二者间的复杂纠结联系，即当代作家的不同文化立场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审美选择与叙事艺术，其叙事艺术又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化立场的表达。作者预期的研究重点，一是通过对不

同作家创作群体的探讨，勾勒出“文革”后中国文学由一体化文学向多元化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是通过对代表性作家的个案研究，理清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的总体形貌与个别差异。其间需要面对的难点显而易见，譬如，如何避免将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如何在描述出各作家创作群体的共性的同时，充分凸显单个作家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的个性？如何在对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做出价值判断时，对同样作为当代人的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保持理智、清醒的反思？在将要展开的论述中，我们只能是尽力地去克服这些难题而已。还需说明的是，对“代表性”作家的选择，除了注意其典型性外，无疑还包含了作者的偏爱和一段时间的阅读重点等成分在内。

一

“文革”后中国文坛的创作重任，最初主要是由两部分作家——我们不妨称其为“归来”一代和知青一代——来承担的。[①]“归来”一代作家的成分稍显复杂，既包括 1949 年以后因历次政治运动遭到排挤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丛维熙、邵燕祥等），也包括那些成长经历、知识背景、文学观念等同以上作家相近但“文革”中仍能进行创作、没有离开文坛的作家（如刘心武、蒋子龙、谌容等）。

① 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代际划分，学界有大同小异的划分法。这里的两代大致相当于李泽厚所说的第四代作家和“红卫兵”的一代（参见《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以及刘小枫所说的“解放一代”和“四五”一代（参见《“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概括一点说，即有论者所说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作家。[①] 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在以往的岁月里有过怎样的辉煌和坎坷，“文革”后的“新时期”都给他们以“重生”之感。这种重生感，不仅来自他们中的许多人重新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而且因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抚摸着流血的伤口、唱着“归来”的歌重返文坛的，悲喜交加的情绪和巨大的愤怒充溢于他们“文革”后最初的创作中，对伤痕的描绘和对历史的反思成为他们那时创作的两个主要的题材与主题领域。在当时公认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历史转折时期里，“归来”一代作家的创作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有那么多的社会历史问题需要作家去正视去反映，有那么厚的积压已久的情绪情感需要作家去抒发去宣泄，还有那么多的文学禁区和文学地雷需要作家去突破去挖掘，而老一代作家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轻一代作家还需先走过自己的一段成长成熟之路，人到中年的“归来”一代，则既有以往的创作经验作基础，又有坎坷的人生经验作素材，还有一腔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巨大的热情作动力，于是主客观条件使他们迅速地进入到创作的前沿阵地，引领了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潮流。

“归来”一代作家“文革”后的创作，基本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展开的。在历史层面，他们曾讴歌过、期望过的新时代成了“左”倾泛滥的时代，对青春、理想、信仰的歌颂衍变成了青春、理想、信仰、人性遭践踏的故事。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无穷灾难和是非颠倒，作家们是怀着一种心有余悸、不堪回首的复杂心绪来写的。对于过去苦难的描绘，就这些作家特别是张贤亮、丛维熙这

① 许志英：《回顾与前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题》，《江海学刊》1996 年第 5 期。该文将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的作家统称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作家”。

样的作家来说，大多是带有一些自叙传色彩的。但作家基本不沉浸于个人的苦难中落泪伤神，而通常会将它作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苦难的一部分来加以表现。他们描绘“伤痕”的作品，多少带有一些情绪宣泄、激情控诉的成分在内，但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结局和对新的美好未来的期望总会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乐观的基调，那些塑造了九死而不悔的革命者落难和知识分子改造的作品，甚至还流露出浓厚的英雄主义气息。那时“归来”一代作家创作的焦点，大多集中在阻止历史灾难重临一点上。以张贤亮为例，他不仅在《四封信》中让人物在稿纸上写下了“决不能让林彪、‘四人帮’这样的事再出现一次”这样的话，而且自己在日常现实生活里给友人的信中也写道：“我早已设定了自己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不能让我们国家民族再次陷入全面疯狂和全面贫困的深渊。”[①]只有经受了极“左”思潮危害的人才会对极“左”思潮的危害有切肤之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由“归来”的一代作家去引领、完成伤痕、反思文学的创作，正是历史的必然。

在将刚刚过去的时代描绘为“左”倾泛滥的时代的同时，“归来”一代作家也完成了对当下时代的指认。他们普遍地在创作中传达出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种信息不仅反映在王蒙的《蝴蝶》《春之声》等作品中，也反映在张贤亮的《霜重色欲浓》《吉普赛人》等作品中。在《吉普赛人》里，四个留校的大学生为中央“关于摘掉多年守法的地富帽子和落实地富子女的政策的决定”举起了葡萄酒杯：“刚刚宣布的决定，其实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我们能够真正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他们几乎都是轻而易举地完成对过去历史的拒斥和对当下时代的接纳的。也正是这

① 张贤亮：《致王蒙的邀请函》，《边缘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9 页。

种对当下时代的快速接纳，使“归来”一代的作家在随后而来的改革文学潮流中，焕发出了干预现实的巨大热情；而在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把握上，则明显呈现出向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归的趋势。①

“归来”一代作家的创作，初期都基于一种政治文化立场。所有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一致。被视为“文革”后文学开山之作的《班主任》，虽然说朴素地喊出了“外国也有好的东西”、“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共同心愿，但作家的思考和描述其实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远没有达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忧愤深广。许子东在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时，曾归纳出四种不同的叙事模式。② “归来”一代作家叙述的“文革”故事大多可以归入“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坏事最终变成好事”两种。采用前一种模式的作品既塑造了九死而不悔的英雄形象，同时传达了一种信息——历史的灾难是由少数几个丑类所造成的。当时作家惯用的一种写法，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地痞流氓落入了同一牢房而受到后者的欺辱，这一方面使真正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的内心痛苦，信仰经受了极大的考验，同时完成了对于人妖颠倒的历史画面的描述，并传达了一种信息：只要将真正的历史丑类铲除，历史就会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这类创作的典范之作。采用“坏事最终变成好事”叙述模式的作品，对党、知识分

① 如张贤亮在 50 年代创作的给他带来噩运的《大风歌》里便写道：“听！我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我知道/谁不满怀着热情、谁不满怀着爱/谁就不配进入/你带来的这个时代”。

② “一，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二，体现‘知识分子——干部’的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坏事最终变成好事’；三，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很多好人合作坏事’；四，‘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我也许错了，但决不忏悔’。”（《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67 页。）

子和人民关系的反思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作品中既有对苦难的描绘,也有对落难的党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受到人民的庇护和拯救的描述。作品最终会让逃出苦难的主人公传达出感谢苦难的信息,因为是苦难使他们与普通老百姓有了真正的接触,是苦难使他们获得了对生活的重新认识,是苦难使他们体验到了人性的温暖和民间的温情。张贤亮的一系列作品便集中反映出这种倾向。着眼于更广的范围来看,"归来"一代作家不仅叙述"文革"时采用了这两种模式,而且将这两种模式扩展到对其他时段的历史叙述中。

应该说,"归来"一代作家复出以后的创作,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他们那一时期的典型心态和文化立场的。尽管他们刚刚经历了历史的风吹雨打,绝大多数刚以异类的身份回到所谓人民的队伍中来,但他们所思考所表现的并不是什么个人的苦难恩怨愁仇,而是国家、民族、党的悲剧、教训和前途。王蒙不仅在谈到自己 50 年代创作时动用了母亲和儿子的比喻来描绘自己与党的关系,[①]而且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表明:"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②]他并且多次表示,在他那里,革命和文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如果要在两者中作出选择,他肯定会选择革命而不是文学。王蒙笔下的坚贞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事实上就是作者的忠实的代言人。钟亦成一俟平反昭雪,便高声地发出了对党的赞美:"向党中央的同志致以布礼!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同志致以布礼!向全世界的真正的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致以布礼!"(《布礼》)丛维熙对党、国家和个人间的关系也抱同样的态度和立场。他曾说:"我们这一代在黄金岁月中孕育落生的作家,是热爱我们这个国家,和领导我们前进的共产党的;即或我们中间许多人,从 1957 年之后,受了 20 年的磨难,仍

①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读书》总第 1 期,1979 年 4 月。

② 王蒙:《我们的责任》,《文艺报》1979 年第 11、12 期合刊。

然对祖国忠贞不渝……”[①] 他所创作的《泥泞》《雪落黄河静无声》，张扬的是一种对党和祖国的无条件的近于愚忠式的爱。最走极端的是刘绍棠所持的观点：“党是我的亲娘，是党把我生养哺育成人，虽然母亲错怪了我，打肿了我的屁股，把我赶出了家门，我是感到委屈的；但是，母亲又把我找回来，搂在怀里，承认打错了我，做儿子的只能感恩不尽，今后更加孝敬母亲。”他并且称那种怀恨在心、逼着母亲给儿子下跪、啐母亲脸的行为是“忤逆不孝，天理不容”[②]。这是套用母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比附党和个人关系的最极端的例子。而梁南在题为《我不怨恨》的诗里，则用“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来隐喻遭受鞭打的知识者对人民的态度。或许，对于王蒙一类早就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革命和党的作家来说，无条件的牺牲和信仰已经化为他们的血液溶铸于他们的生命中，对党和人民的任何的怀疑和动摇都是一种类似于不孝的不道德行为。而就张贤亮这样的作家来说，他们长期的改造和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成为党的一分子和人民中的一员，因此尽管他这时的政治身份同王蒙等作家还有差异，但他对苦难和人民的认识却同党员作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他曾说：“我接触过许多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是委屈的、不平的、愤懑的，但是这些幸存者中没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和意志坚强的话）不承认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劳动与物质的变换中获得过某种满足和愉快，在与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治疗了自己精神的创伤，纠正了过去的偏见，甚至改变了旧的思想方法，从而使自己的心灵丰

① 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1981 年 7 月 23 日），刘金镛、房福贤编：《丛维熙研究专集》，重庆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57 页。

② 刘绍棠：《走在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9 页。

满起来的。”[①]他还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庸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②]言下之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中国作家对党和人民的信仰都没有动摇过。张贤亮自己确实也用《灵与肉》《绿化树》一类创作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后来，当西方有人将张贤亮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时，他自己却说：“我以为西方不应该把我当做中国的一个 Dissident Writer(反抗作家)，中国的批评界也无须把我看作是一个敌对分子。”[③]我们不排除这种自我辩白中可能包含了一个饱经政治风浪之苦的作家自我保护的成分在内，但结合这个作家及其同代作家的成长道路和总的创作倾向来看，要这一代作家做一个反抗作家比做一个遵命作家要困难得多。我们看到，不仅刘心武在《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对那些厌倦了政治运动而走向消沉的青年表现得忧心忡忡，而且王蒙也在《最宝贵的》《蝴蝶》等作品中对那些失去了信仰和主义、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的下一代显得焦虑不安。王蒙所强调的对党和革命的爱，甚至常常不经任何过渡就顺延到党和政府的官员身上。《蝴蝶》《悠悠寸草心》都触及了反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落难的“官”在“民”那里得到了拯救、抚慰。与其他作家同类题材作品有所不同的是，王蒙特别写到了底层民众对重返政坛的“官”们的期望和支持。《悠悠寸草心》中的吕师傅甚至在初次拜访老唐夫妇

① 张贤亮：《心灵和肉体的变化》，《张贤亮选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7 页。

② 张贤亮：《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张贤亮选集》第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78 页。

③ 张贤亮：《参与、逃避和超越》，《边缘小品》，第 147 页。

受冷落后对老唐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同情："……好不容易咱们自己的老同志重又当了'官'，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去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种种迹象表明，王蒙的自我认识是准确的："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我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①]可以说，正是这种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文化立场，使"归来"一代的作家与更年轻的一代如宣扬"我不相信"的作家形成了思想观念、题材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如张贤亮在谈到文学的"自我表现"时，便没有看到这一命题对过去文学的过度政治化的反拨意义，而是大谈特谈"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他"[②]。从这种不无嘲讽的语气中，我们不难看出复出不久的张贤亮不仅对更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是隔膜的，而且其过往经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想像力和对文学的理解。

"归来"一代作家的创作，均可归入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们普遍热衷于问题文学的创作。他们在创作中反映平反昭雪问题、党群关系问题、青年教育问题、家庭婚恋问题、个人权益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等，对社会政治、道德伦理表现出了莫大的干预兴趣。他们一方面痛感过去的文艺政策对文学的干涉过多，一方面又很难设想有一种脱离时代的政治生活而存在的文学创作。在观念上，他们走得最远的也莫过于通过创作来探讨一下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而他们之所以卷入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一是过往的经历使他们亲身

①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② 张贤亮：《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给李国文同志的信》（1984年元月4日），《张贤亮选集》第三卷，第653页。

感受到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会导致人性的全面灭绝，二是哲学界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援，三是文艺理论界对“文学是人学”的重提使他们感觉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的落伍。可以说，虽然这批作家一度引领了“文革”后中国文学的最初创作潮流，但其中大部分作家是不自觉地被卷入的——是一个文学的青黄不接的时代将他们推向了文学的前台，让他们承担起了中国文学从一个荒芜期向一个文学的多元化时代转换的开山使命。在文学形式上，这批作家虽然也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如王蒙创作了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张贤亮在《灵与肉》中借用了意识流手法与拼贴画结构方式，高晓声稍后也尝试用象征、荒诞手法进行创作，但这种外来形式与中国化主题结合的方式总显现出其特有的生涩之处，远不如后来的先锋作家借用外来形式那么圆熟。特别是，即使在他们创作的伤痕、反思文学中，“归来”一代作家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所达到的深广度也是有限的。正像有人所说的：“祖国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观念。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规范。”“我们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控诉极‘左’路线的滔天罪行，却不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要求人们原谅极‘左’路线……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①]《雪落黄河静无声》一类的创作和“母亲打儿子”一类的论调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人民对祖国、党的爱混同于一种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忠孝节烈观念式的抽象情感，以对国、对党的爱取消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再如，丛维熙曾说自己“认识到十年浩劫不是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

① 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 年第 5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